

实践与符号：马克思与卡西尔的比较与融合^{*}

——兼论数字时代人的生存与发展

赵士发 张 昊

摘 要：对于人的存在与本质问题的研究，卡西尔试图解决方法论危机，转向功能性路径，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与经验主义。卡西尔将人的活动视为符号活动，将人的本质视为劳作，将人的存在场域视为符号宇宙，虽然超越了传统哲学，揭示了人的感性活动的根本中介——符号，但是他局限于对人的精神生活的阐释，割裂了符号与现实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人的活动理解为实践，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将人的存在场域理解为感性世界。主张从社会关系出发将人作为现实的具体个人进行考察，是马克思与卡西尔人学的根本区别。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作为符号存在的人发展到数字生存的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整合了马克思和卡西尔的理论，对数字时代人的生存发展问题进行了全新考察。

关键词：存在，人的本质，实践，符号，数字生存

Practice and Symbol: A Comparison and Integration of Marx and Cassirer on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Age

Zhao Shifa Zhang Hao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human existence and essence, Cassirer attempts to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1&ZD046）阶段性成果。

resolve the methodological crisis and take a functional approach, surpassing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and empiricism. Cassirer regards human activities as symbolic, human essence as labour, and human existence as a symbolic universe. Although he transcends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reveals symbols to be the fundamental intermediary of human perceptual activities, he limits his interpretation to human spiritual life and disconn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mbols and reality. Marxist philosophy interprets human activities as practice, human essence as the sum of all social relations, and human existence as the perceptual world. It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Marx's and Cassirer's approaches to human studies that Marxism advocate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individuals as real and concrete ent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lations.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ge, people who exist as symbols have evolved into a new stage of digital existence. Chinese Marxist semiotics integrates the theories of Marx and Cassirer and makes a novel investigation of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s in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existence, human essence, practice, symbol, digital survival

DOI: 10.13760/b.cnki.sam.202402002

随着数字时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发生转型,马克思与卡西尔的有关思想和方法重新进入学界研究的视野。卡西尔在《人论》开篇指出“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2013, p. 3)同“认识自我”在哲学旨趣中的地位一样,本体论也被视为一切哲学思想的阿基米德点,决定了哲学思维的基本倾向,因而在哲学史上一般没有本体论就不被视为哲学。在传统哲学对本体论的研究中,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生成论”,另一种是“存在论”。卡西尔旨在从存在论出发为文化哲学寻找本体论根基,他指出:“哲学的思考是从‘存在’开始的。就是由于存在这个概念的出现,人们的意识觉察到了与存在着的事物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相对的存在的统一性时,这一面对世界的特殊的哲学方法就诞生了。”(Cassirer, 1953, p. 73)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存在物,因而它倡导实践生成论的方法。在数字时代,人的生存转向数字生存,融合马克思与卡西尔的方法,联系当代实际考察人的存在问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一项紧迫的理论任务。

一、人的实践与符号活动

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的存在的体现，也是人的存在方式。哲学家们在讨论人的存在时都无法回避人的活动这一问题。卡西尔在应对人类认识自我这一危机的基础上，拓展了新康德主义的理论视野，发展出了新的文化哲学。在《人论》中，卡西尔认为，每个哲学家在阐述人的问题时，都是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他们总是告诉我们事实而且仅仅限于事实”（2013，p. 37），经验主义并不能得出本质，而只能得到部分事实。卡西尔认为马克思推崇人的经济本能，这意味着，在卡西尔看来，马克思作为经验主义者，其对人的认识建立在对人的活动围绕着经济活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界定为经济决定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误解。在此问题上，卡西尔从新康德主义出发，虽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超越，但是仍然带有马堡学派的理论指向。

马克思与卡西尔在讨论人的活动时，都曾将人与动物进行对比以阐释人的活动的独特性，但是二人的研究路径却根本不同。马克思从现实生活出发讨论人的活动，卡西尔则从精神生活出发讨论人的活动。马克思反复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从实际活动的人”（中共中央编译局，2009a，p. 525），这种实际的人的活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要在“现实的个人”（p. 524）的生活的进行把握，而不是在抽象概念中进行把握。而卡西尔则认为，不能以任何形而上学或者物理学的方式定义人，必须抛弃实体路径，转向功能路径，否则就是靠经验的观察来定义人。由此可见，在卡西尔那里，仿佛一切关于人的问题的非功能性的研究得出的知识都是经验主义的。

马克思认为人的活动是感性活动，是实践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的感性活动概念是对费尔巴哈“感性直观”概念的扬弃。在费尔巴哈看来，感性直观是直接性的、确定性的，这是不同于传统哲学的。这种感性直观是理论上的直观，而实践中的直观被费尔巴哈当作自私的个人利益的满足，被置于理论活动之下。费尔巴哈将感性这一长期被理性主义人学贬低甚至拒斥的东西提升到了本体论地位，但是，通过感性直观把握到的人依然是“抽象人”，而非“现实的个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2009a，p. 162）人通过对象性的活动，即实践，使自身成为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实践作为人的活动，是人的存在方

式，人的感性、理性、情感、直觉等都在其中共同构成有机的总体，每个方面都缠绕其中。马克思并未像传统哲学那样，从实体路径对人进行定义。人并非只是“理性动物”“社会动物”“政治动物”，抑或是感性、理性、情感、直觉的某个方面的动物，而是以人特有的活动形式，即实践的方式存在着。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中共中央编译局，2009a, p. 163）这种“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和“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的对象化能力是人的活动的独特性，是人的超越性的体现，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展现。人的活动在理性与感性、人与自然之间搭起了桥梁，使人能够打破规定性，实现人的超越性，使人不同于动物。而动物的生命活动就是它本身，其自身并不能超越生命活动，只是被盲目必然性即本能规定着的存在。

卡西尔在人的活动的研究上，实现了方法论意义的转向，即功能路径的转向。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近代以来人是什么这个问题遭遇了方法论危机，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最早意识到了这一危机。在哲学的发展史上，在苏格拉底那里，哲学的思考从天上回到人间，从对宇宙本原的求索向内转向为对人自身的认识，认识人自身这个问题自此开始在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卡西尔看来，以往的哲学并未发生对人的认识的方法论危机，是因为总有一种方法在此问题上承担起了领导权并规定了此问题的研究路径，从形而上学到神学，到数学再到生物学。苏格拉底通过对话式的辩证法得出“人是理性动物”的结论，人的活动则是理性活动。中世纪哲学时期，神学在此问题的研究上占据了领导地位，人的理性由最高力量被贬低成“使他人误入歧途的诱惑物”和“最深的耻辱”（卡西尔，2013, pp. 18 - 19）。人被规定为神秘的混合物，只有通过宗教才能把握人的本质，这种本质就是神秘和含混。“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正是矛盾。人根本没有‘本性’——没有单一的或同质的存在。人是存在于非存在的奇怪混合物，他的位置是在这对立的两极之间。”（卡西尔，2013, p. 21）近代哲学从笛卡尔开始试图将数学思维作为真正理解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的钥匙，以数学理性作为人和宇宙的纽带。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后，生物学继数学之后占据了分析人的问题的研究方式的领导地位。进化论消除了有机生命的不同类型中的界限，一切生命都可以还原至最简单的初始的种，其间的区别再也不是质的鸿沟，而只在于时间的推移。但是，这种生物学的方法是无法用于分析人类文

化的。当一切方法不再占据领导权时，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就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卡西尔从这一危机开始，拒斥对人的问题的实体路径研究，试图以功能路径进行方法论意义上的变革。

卡西尔认为，人的活动是符号活动，是人的符号功能的体现。卡西尔同马克思一样，以人和动物的区别阐述人的活动。他认为，将人概括成“理性动物”，是“以偏概全（pars pro toto）；是以一个部分代替了全体”（2013，p. 44）。理性只是人的特征之一，但是人并不是全然理性的动物。卡西尔肯定了将人定义为理性动物的思想家们，在此他否认他们是经验主义者，认为他们并不打算做出经验陈述，而是做出一个根本的道德律令。这同他将一切非功能性路径的研究都视为经验主义是相互矛盾的。卡西尔认为，识别人与动物的活动不同，只能从两者的功能圈（Funktionskreis）不同入手，而不能以某一种特性加以概括。他认为，人的功能圈不仅在量上与动物不同，在质上也有所变化。动物只能对信号做出反应，而人能够应对符号，人的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活动。二者的区别在于应对符号所做出的符号活动，带有一种延迟，因为符号是“指称者”（designators），总是指称着某个名词或具体概念，带有功能性的价值。信号则不同，信号只是“操作者”（operators），直接对应着某种物理的或实体性的存在。因此，卡西尔反对以任何一种特征概括人的活动，而主张必须抓住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即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符号活动，是对符号的应对活动，并且只有人才具有符号化的抽象能力。

从本质来看，卡西尔所提出的功能路径的转向是对人的活动中介的概括，而马克思将人的活动阐释为实践则是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且并非经验主义的。马克思本人就曾明确指出，从处于现实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出发，“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中共中央编译局，2009a，pp. 525 - 526）。卡西尔虽然也强调，不能以经验观察得出抽象概念，并以此概括人，但是他所概括的符号活动是人的感性活动的中间环节，即人依靠什么实现感性活动，尤其是实现精神活动。这种概括方式就好比对人类文明形态的概括，石器文明、电子文明，乃至当今的数字文明，都是从人的活动的中介变迁的角度予以说明，卡西尔则是抓住了人的精神活动的根本中介，无论是语言、电子还是数字，都是符号的一种，都是人的符号活动的体现。正是因为人具有符号功能，抽象才得以可能，人才拥有一种虚拟能力，能够创生出语言。但是，正是这种对功能路径的过分强调，使卡西尔对人的存在问题的把握逐渐远离客观的物质世界，远离了马克思所强调的“现实的

个人”，最终走向“抽象人”。

二、人的“社会关系”本质与“劳作”

人的本质在人的活动之中展现，是人区别于他物的根本特征，也是人的存在不同于他物存在的根本特征。对自身本质的反思和探寻是人的一种高度自觉意识。“本质”是相关性概念，人的本质总是在与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本质的比较之间得到诠释的。人的本质作为哲学上的一个热点问题被许多哲学家长久地讨论着。唯心主义与宗教神学试图将人贬低以留出位置给上帝或者造物主，使人处于一种被更高级的存在支配的地位。旧唯物主义则将人视为自然界的产物，且认为人完全受制于自然界。张奎良（2014）认为，马克思在1843年末到1845年初的一年半时间里，先后提出了六种对人的本质的定义：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类本质、人的发展本质、人的共同体本质、人的社会联系本质和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本质。在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上，马克思与卡西尔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试图走出人的本质外在化的理论困境，使人的本质回到人自身。

马克思由费尔巴哈出发，超越了将人的本质外在化的传统哲学。费尔巴哈提出人的本质就在人自己，“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1984，p. 249）。人的本质不在别处，就在人自身之中。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出发，使人的本质回归到人自身，提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但费尔巴哈将上帝从更高级的存在的地位赶走时，又将人置于上帝的位置，他认为人的上帝其实就是人自己。马克思扬弃了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的观念，实现了超越，开创了新唯物主义。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只指出了人的本质应该向人探求，而非向上帝探求，这只是人的本质的来源，而并非人的本质的内涵。因此，马克思又提出人的类本质。费尔巴哈认为人的类本质，也就是人区别于其他类的根本所在，并将它归结为人的意识，也就是人的理性、爱、感情等。虽然人具有动物没有的意识，但是意识又从何处产生呢？费尔巴哈在对人的本质的探求上是不彻底的。对于马克思来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类本质，但是这个类本质并非费尔巴哈所概括的“意识”，而是人的“感性活动”。

马克思扬弃了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概念，将人的本质视为动态发展的，而非静止固定的。马克思并未止步于费尔巴哈的类概念，类本质虽然为人和动物划分了界限，但是也将人的本质划定在了静态范围内。马克思认为，人

类的历史是运动着的，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他提出了人的发展本质。由人的需要出发，人需要满足自身的生存条件，完成自身生产。在需要的无限与实现需要手段的有限中，人不断超越，突破规定性，这是人的发展本质。

马克思并不满足于在概念上辨析人的本质，他对人的本质的实现也颇为重视。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部本质只能在社会中外化和实现。从人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自身开始，人就在社会中实现自身本质的对象化，人的一切活动都具有社会性。“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中共中央编译局，2009a，p. 187）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人的共同体本质、人的社会联系本质，意在说明人的社会性本质，人实现本质的过程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

马克思刻画了较为完整的人的本质图景，由人类的本质发展出人的个体本质。从人的本质与其他类的区别出发，得出的结论只能呈现人与动物的不同，无法呈现人与人的不同即单个人的本质。马克思在探索个人的本质上，并未落入经验主义或传统形而上学之中。马克思没有将个人的本质视为静止不变的或是抽象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009a，p. 505）由此看来，“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马克思那里是发展完成了的人的本质概念。马克思将人的本质从被上帝和神支配的位置中拯救出来，使之回到人本身，从人与动物的区别入手进行对人的类本质的概括，这都只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探讨的发展阶段，“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马克思对抽象的类中的具体的、现实的、个人的本质的概括，是对人的本质的探讨的完成形态。

卡西尔也试图使人的本质回到人自身，但他将人的本质限定在人的精神活动之内。卡西尔并未对“人性”或“人的本质”的不同加以关注，这并非他所讨论的重点。他所关注的是研究人的本质问题的方法论：“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2013，p. 115）功能路径的转向使卡西尔对人的本质认识有了一定突破，他并不把人的本质视为静止不变的，而是运动的与发展的。卡西尔认为：“人的突出特征，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

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p. 115) 卡西尔的“劳作”概念并不同于马克思的“劳动”或“实践”概念。“劳作”所强调的是人的精神活动，卡西尔虽未言明，但仍暗示了只有人的精神活动才被视为人的本质的决定因素，人的精神活动使人与动物拥有了不同的本质，且规定了“人性的圆周”。

卡西尔虽然试图将人的本质问题推向更加具体的功能性路径，但是忽略了人的物质生产的方面。卡西尔与马克思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试图使人的本质问题超出形而上学，拒斥将人的本质放置在一个静止封闭的盒子当中。马克思将人的本质概括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将人的全部感性活动作为人的本质的决定因素，这并非功能路径，而是将人作为具体的现实的个人。卡西尔虽然试图把握具体的人，但是显然具体的人所从事的活动并非只是精神活动。人将自然界对象化的过程，进行物质生产的过程，同样是感性活动的一部分，是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人的精神活动，即卡西尔所说的“劳作”确实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但是精神活动显然不是最根本的因素，而是取决于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三、人的感性世界与符号宇宙

人的存在场域是人的活动的场所，是人实现本质的场所，是现实的个人展现不同于他物特征的空间。马克思与卡西尔虽然并未直接对人的存在场域进行讨论，但是在各自的阐述中都对此有所涉及。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存在场域问题体现在他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分析中。在卡西尔那里，他对人的生活场所做出了概括。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并未将人视为感性直观，而是具有超越性本质的存在。但是，卡西尔将“人”完全放置在其自身生产的精神产物之中，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联系。

马克思将人的存在场域视为感性世界，也就是人化自然。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中共中央编译局，2009a, p. 161) 人与自然界在人的感性活动的过程之中不断进行交互作用，人将自然界中的物对象化，也利用自然界中的物使自己生存。“人类社会在直观上体现为一个‘物’的感性世界，而其深层的内涵却是一个处处渗透和体现着人的特性、人的活动和人的意义的世界，是一个‘物性’和‘人性’的统一体。”(欧阳康，张明仓，

2002) 人类所存在、生活的场域是一个感性世界, 人在感性世界中活动, 在这个感性世界中, 人展现本质, 建构意义, 进行人的活动, 也通过感性活动不断形成和发展这一存在世界。在马克思看来, 感性世界是与自然界紧密联系的, 是通过人对自然界的对象化形成的, 而不是人脱离自然界构建的, 也不是人头脑中的想象世界。

卡西尔将人的存在场域视为符号宇宙, 指出人已经逐渐远离物理实在。卡西尔认为, 由于人具有符号活动能力 (symbolic activity), “人不再生活在一个物理宇宙之中, 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 (2013, p. 43)。人生活在“新的实在之维”中。人通过创造符号, 建构意义, 得以不再面对物理实在, 而是面对着自己创造的符号, 也就是存在于人类自我建构的符号宇宙中。并且, 由于符号宇宙的存在, 人不是同事物本身打交道, 而是同符号打交道, 从根本上来说, 人是在不断同人自身打交道。在这里, 卡西尔不仅提到了人在理论领域中的存在, 也提到了人在实践领域中的存在。但是, 在卡西尔看来, 人在实践领域中也并不是生活在事实之中, 而是生活在“想象的激情之中”, 生活在“希望与恐惧、幻觉与醒悟、空想与梦境”之中。(p. 44) 由此可见, 卡西尔将人置于人的精神产物中, 而忽略了人进行符号活动的物理实在。

在当人类数字化生存的语境下, 卡西尔的符号宇宙概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的存在问题上更突显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卡西尔由新康德学派出发, 功能路径的转向可以使他被称为 20 世纪的现代哲学家。在人的数字化生存下, 正如卡西尔的符号宇宙概念一样, 人仿佛生存在意义世界和符号世界之中。由于符号活动能力, 人能够不断创造新的符号, 人生活在符号充斥的世界之中, 人自身也成为符号, 以至于迷失自身。在虚拟技术所创造的虚拟空间出现前, 人的虚拟活动仅限于人运用符号进行想象、幻想, 在符号学的意义上, 利用符号进行“筹划”, 即行为前的构思。但是,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虚拟空间的开拓, 人们有了新的实践形式即虚拟实践。虚拟实践, 就如同卡西尔所说的那样, 逐渐远离物理实在, 人所面对的不再是物, 而是自己创造的符号、产物。

然而, 在方法论意义上, 马克思虽然并未在同一种意义上使用“符号”一词, 但是早在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 他就已经打破了这种符号宇宙使人与物理实在截然割裂的认识。马克思揭示了商品既可感觉又超感觉的奥秘之所在, 他指出: “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 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 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

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共中央编译局，2009c，p. 89）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商品呈现出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遮蔽，就形成了商品拜物教。符号也是一样，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符号遮蔽时，符号拜物教就产生了。因此，要想揭开符号宇宙的神秘面纱，就必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之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寻找立足点，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同时，虚拟实践虽然在实践空间中进行，但依然是现实的个人所进行的感性活动，承担实践代价的仍然是现实的具体的个人。在此意义上，现实的个人的精神活动虽然被符号宇宙包裹着，但是其存在场域仍然是感性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方法论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四、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视域内数字时代人的生存与发展

在比较马克思与卡西尔对人的存在与本质问题观点的基础上，需要将二者的方法进行综合，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出发，考察当今数字时代人的生存问题，会得到一些新的理解和观点。

只有将卡西尔的符号学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进行改造，将符号与现实统一起来，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卡西尔的符号概念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根本中介，但是卡西尔对人的存在问题的研究视野局限于精神活动，他在试图使人的存在由抽象走向具体的过程中，并未彻底完成这一目的，而仍然走向了“抽象人”。卡西尔的《人论》试图开辟功能性路径，研究人的存在问题，以解决方法论危机。卡西尔将符号活动作为人的活动，将“劳作”视为人的本质，将人的存在场域视为符号宇宙，拒斥了形而上学与经验主义，超越了以往传统哲学对人的本质等问题的理解。但是，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割裂了符号与现实，消解了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性。这是卡西尔并未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所在，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所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一方面重视符号概念的中介作用与抽象性，另一方面重视符号与人的关系，注重对符号意义社会性的观照，在人与符号关系问题上形成了符号人格化的观点。符号人格化思想即坚持符号的意义是属人的，符号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反映。

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角度看，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符号是意义的物质载体，符号离不开人及其社会关系。从人的社会关系角度来看，符号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层面的关系，人始终是社会关系的主

体与核心。数字时代是世界符号化发展的新阶段，人与世界的关系全面数字化，人的存在和本质必然会发生新的变化。

数字时代人的存在与本质发生了新变化。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角度看，数字时代人的存在与本质体现为数字人格化与人的数字化。所谓数字人格化，即在数字时代，数字普遍渗透于人的活动过程始终，数字内化为人的活动方式，数字劳动成为主要的劳动形式，数字成为人的社会关系的代码。所谓人的数字化即人的活动高度依赖数字，特别是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人在本质上逐渐演变成所谓的数字人。人的存在和本质与以往相比，无疑更加丰富了。人不仅具有物质存在形态与精神存在形态，现在又产生了数字存在形态。在本质上，人在具有自然生命与社会生命的同时，又具有了符号生命与数字生命。也就是说，人在本质上不仅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也是社会关系性的社会存在物，还是有意义的符号存在物。在人现有的三重生命存在形式中，作为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的人，会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消失。但作为有意义的符号存在物，人的意义不会消失，而是在符号世界得到永生。随着数字技术与脑机接口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符号的复制、编码与传播越来越便利，每个人的意义都会随着符号编码而被继承下去。甚至一个人的意识可以通过脑机接口导出，再导入他人的大脑，个人的意义与符号生命由此得到延续。

数字时代人的类存在与类本质将会成为可能。在哲学史上，思想家们关于类本质与类意识的论述很多，但在数字时代来临之前，都只是抽象的议论与理论上的可能。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人类的类意识正逐步形成，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类存在物，人的类本质得到确证。一方面，随着计算机算力、大数据、互联网络、云数据平台、脑机接口等先进技术的发展，每个人大脑中的意识通过符号同云数据平台链接并融为一体，形成真正的人类意识。人类因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类成为一种主体性的存在，人类主体得以生成。另一方面，数字的普遍性与抽象性将消解私有财产的特殊性与具体性，使人类共同利益成为现实。虽然数字与资本一样具有人格化的特征，但二者具有极为根本的区别：资本具有天生的私有性，而数字具有天生的公共性。数字技术将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人类劳动力将获得解放；数字化新产品共享更为方便，数字经济是一种共享经济；数字化技术与专利技术是矛盾的，它排除专利制度；数字化将促进政治民主，使一切权力运行都置于网络民主的监督之下，甚至让个人的一些不合理的隐私也无处可藏。但物质财富私有制的消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将首先让人类精神的

共同富裕成为可能,然后反过来促进人类物质上实现共同富裕,从而加速私有制的消亡。那时,马克思一生致力研究的个体与类的矛盾将得到解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共中央编译局,2009b,p. 53),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类的解放将得到真正实现。

当然,数字时代也会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各种各样的挑战,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与研究。一是数字异化问题。由于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十分迅速,有可能形成数字拜物教,反过来支配与制约人的生存与发展。二是数字安全问题。数字总是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载体,如计算机、储存技术等,且依赖电力作为运作基础。这些条件发生故障或产生数字病毒,就可能导致数据损失。三是数字伦理问题。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伦理问题,如个人合理的隐私权、数字增强技术与脑机接口技术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改变等。四是数字犯罪问题。由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影响,一些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运用数字技术进行各种犯罪活动。五是数字鸿沟问题。由于人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同人、地区、国家之间会产生数字鸿沟,即数字不平等,导致数字上的两极分化,等等。这些问题无疑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的生存和发展,进而改变人的存在与本质。虽然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但总的看来,盲目乐观与悲观都是无济于事的,数字时代的问题还需要通过数字时代实践与理论的发展来解决。当务之急是直面问题,联合多学科进行共同研究,为解决数字时代的问题与促进数字时代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贡献力量。

引文文献:

卡西尔(2013). 人论(甘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欧阳康,张明仓(2002). 马克思本体论批判的价值取向及其当代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 6, 47-57+205.

费尔巴哈(1984).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 北京:商务印书馆.

张奎良(2014). 马克思人的本质概念的演绎程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 11, 68-76+159.

中共中央编译局(2009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编译局(2009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编译局(2009c).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Cassirer, E. (1953).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Vol. One. *Langu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赵士发，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哲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张昊，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弘毅博士后，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Author:

Zhao Shifa, specially appointed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at Wuhan University. His main research focuses on Marxist philosophy, Mao Zedong'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Marxist semiotics.

Zhang Hao, postdocrate researcher at the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mainly studies Marxist philosophy and Marxist semiotics.

Email: sfzhaodh@whu.edu.cn